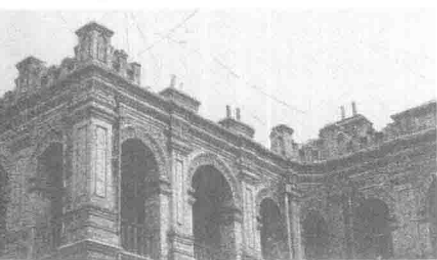


# 北京的洋市民

欧美人士与民国北京

李少兵 齐小林 蔡蕾薇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民国北京史研究丛书

中国人民大学民国史研究所

黄兴涛 郭双林 主编

编委会

主 编 黄兴涛 郭双林

副主编 李少兵 左玉河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 钊 牛贯杰 王建伟 付海晏 左玉河

李少兵 陈 鹏 杜丽红 宋卫忠 郭双林

赵晓阳 唐小兵 黄兴涛 董 玥 谭徐锋

## 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城市史研究逐渐兴起，并迅速发展成为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城市规划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热门领域。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的城市史因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特别是近十年来，古老北京的现代转型，尤其是民国北京史研究受到了学者们的格外关注，成为当代城市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热点问题。

民国时期是北京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阶段。如果说清末十年北京的现代化城市建设刚刚发轫，那么随着帝制的覆灭，北京迈向现代化的步伐大大地加快了。现代市政机构的设置和城市管理体制的改进，城市空间和基础设施的改造，社会组织的发展，现代工商业的初兴、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等，从不同方面共同作用并整体深刻地改变了古都北京的面貌。同时，由于政局不稳、观念保守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的制约，这一历程又显得异常艰难，折射出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及其限度。因此，深入考察这一时期的北京历史，无疑有助于我们探索和总结传统政治文化中心城市现代转型的一般特点。当然，城市现代化自身，也是今人需要严肃反思的主题。

北洋政府时期的北京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延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它虽然不再是首都，但作为“故都”，在全国范围内仍占据着任何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独特地位。诸多具有全国性甚至是国际性影响力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事件，都在此酝酿发生，并影响到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走向。某种程度上说，一部民国北京史也是整个中华民国史的缩影。同时，此时期的北京又有着自身的演变轨迹和发展特点，诸如

地方上的党政关系、治安案件、宗教纠纷、商业活动、工运学潮、文教事业等，均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值得细致探究。把握好全国史与地方史的互动关系，努力挖掘全国性事件所蕴藏的北京地方因素并深入诠释地方性事件所具有的全局性意义，将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华民国史和民国北京史，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自1928年起，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北京曾一度丧失数百年来未曾中断的首都身份，经历了长达21年的非国都时代。短时期内，围绕政治权力运行的社会体系大受冲击，濒临崩溃，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但迁都的影响又绝非“衰落”二字可以概括，还呈现出若干难得的积极面相，如“平民都市”的自觉、文化都市形象的凸显，地方政府和知识分子在逆境中努力发掘城市优势资源，反思和调整旧有发展模式等，也都曾使故都北京呈现出与摩登上海迥然不同的生机与活力。此外，沦陷时期的北京也不仅只有日寇的残暴侵略和北京人民的英勇抵抗，还包含文化遗产的保护、日伪的城市管理、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知识分子故都情结等极为丰富复杂的内容。可以说，1928—1949年的北京（改称北平）历史虽然不长，却能为今人深刻体认北京的发展短板、比较优势，以及城市栖居的文化内蕴等，提供难得的参照。

21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民国北京研究的自觉程度明显加强，以“民国”为时段的北京史研究论著逐渐增多，可谓亮点纷呈，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这既与近代史学界的“民国热”直接相关，也得益于原始资料的开放和利用。北京市档案馆所藏民国北京档案很多已完成数字化处理，学者可方便使用，其他有关北京的地方性报刊、社会调查资料，多保存于北京地区各种类型的图书馆中，很多还被点校或影印出版，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凡此均为研究民国北京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但不可否认的是，与上海史研究和古代北京的研究相比，目前民国北京史的研究还相对薄弱，无论是在问题意识的提炼、理论方法的更新，还是文献资料的运用等方面，都还有很多值得深化提高之处。一方面，我们需要提高对“民国北京史”在整个北京城市发展，乃至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价值的认识，努力发掘尚未充分利用的外文文献、口述史料和影像资料等；另一方面，还应该更加重视北京城市史研

究突出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北京各种城市病日益严重，很多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屡屡发出迁都的提议，中央政府也适时启动了首都功能的部分疏散、京津冀一体化等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这些都为历史学者们通过与现实自觉的对话来更好地发挥史学的作用，创造了有利条件。

今天的首都北京，正是从民国发展而来。首都建设和发展政策的制定，离不开对于民国北京史的参考与借鉴。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以多维的眼光重新审视民国北京的发展历程，特别应在城市功能与规划、城市环境与形象、城乡关系、对外交流、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国内外城市综合比较等研究领域，做出富有创造性的探索。

目前，已经或计划出版的北京史研究丛书已有一些，它们均不同程度地涉及民国北京历史，但迄今为止，尚未出现以“民国北京史”为主题的研究丛书。几年前，我们就酝酿出版这套丛书，并开始为之积累准备。2016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民国史研究所正式宣告成立，明确将“民国北京史”的研究作为主攻方向之一，并在网站上专门开设了“民国北京史研究”栏目，希望能够成为汇聚传播有关研究信息的学术平台。这次出版“民国北京史研究丛书”，就是想借此对该领域的研究继续加以推动。我们计划此丛书先期推出五种，其内容既包括北京的婢女、在京的洋人等特殊群体，也涉及城市犯罪、公共卫生等重要议题，同时我们还选编了一本有关此前民国北京研究的代表性论文集，试图对有心加入这一研究领域的青年同道们，有所启示。但愿这一努力能够持续下去。

衷心希望越来越多的同人关注民国北京史研究，为首都城市的发展贡献历史的智慧。

中国人民大学民国史研究所 黄兴涛 郭双林  
2016年初夏

# 目 录

## 绪 言/1

## 第一章 日益扩大的北京洋市民群体/3

- 第一节 人数总体增长/ 6
- 第二节 人口构成多样/ 13
- 第三节 毗邻使馆区而居/ 48
- 第四节 动态的洋市民社区/ 51

## 第二章 在京欧美人士与北京的政治经济/54

- 第一节 太上政府? ——北京外交使团与中国内政/ 54
- 第二节 中国政府机关里的欧美人士/ 71
- 第三节 商贸金融中心东交民巷和王府井/ 86
- 第四节 欧美人士与北京的近代工矿业/ 98

## 第三章 中西合璧: 北京欧美人士的日常生活/111

- 第一节 极力维持的西式生活/ 112
- 第二节 不可避免的中国元素/ 147

## 第四章 北京欧美人士的社交网络/164

- 第一节 以使馆为中心的社交活动/ 168
- 第二节 欧美社团社交网络的扩展与细化/ 171
- 第三节 女子社交活动的兴起/ 184

## 第五章 北京欧美人士的管理与诉讼/192

- 第一节 在京欧美人士的管理/ 193
- 第二节 领事裁判权与洋市民的民事、刑事诉讼/ 208

## 第六章 欧美人士与北京城市的近代化/222

第一节 欧美教会与北京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的发展/ 222

第二节 东交民巷使馆区与北京市政现代化/ 251

第三节 洋市民眼中的北京城与老北京眼中的洋市民/ 273

结 语/298

附 录/300

参考文献/304



## 绪 言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燃烧到北京城下，英法联军为报复外交使团成员被抓被杀，有意火烧了圆明园。咸丰皇帝逃亡承德，北京居民对此街谈巷议，谈“洋”色变，恐惧、仇恨、敌视，但少了以往的轻蔑与不屑。“西洋人”第一次给北京居民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这印象一言难尽。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北京居民开始扬眉吐气，一些居民加入了义和团，在全城各处搜杀“洋人”。北京的“洋人”则心惊胆战、四处逃命、惶惶不可终日，侥幸逃到东交民巷使馆里的人才勉强保住了性命。

这40年来，北京的中外居民，尚处在不愿意互相了解而囿于偏见“硬性”比较彼此“好坏优劣”的第一阶段，比较的结果可想而知，带来的后果是彼此自觉隔离，互不来往，误会丛生，且没有消解的可能。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经过初期的烧杀报复，逐渐冷静下来，开始反思如何面对人数众多的中国民众。“洋人”不怕清政府，但面对“仇洋”的中国民众，则不能不考虑撤兵后自己的环境安全问题。如何与北京居民“和平友好”相处，成为“洋人”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与此同时，历经浩劫的北京居民面对现实，也终于接受了天子脚下会有“洋居民”长期工作、生活的事实，开始尝试与洋人交往，以求得和平共处。

北京的中外居民思考彼此之间是否可以正常交往、和平相处的时期

持续了近十年。这段历史时期，东交民巷使馆区的欧美外交官与清政府往来频繁，但普通欧美侨民则大多生活在使馆区内“以保人身安全”，双方各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很少交叉重叠。

1912年民国建立后，中国确立了民主共和体制，“主权在民”的观念深入人心，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开始与欧美接轨。各种藩篱减少，北京的中外居民之间开始了自由往来，居住空间有了重叠，“华洋混居”的现象日益普遍，这非常有利于中外市民的交流与融合。此后直到1949年，北京的“洋市民”在工作生活实践中不断探索如何更好地与本地市民友善相处、友好合作成为常态。

本书在查证了大量中外档案、报刊、历史文献等史料的基础上，以社会文化史的视野论述了民国时期北京的欧美侨民，也即长期生活在北京的“洋市民”的人口数量、人口构成、职业分布、居住社区、日常工作与生活、社交网络、管理与诉讼、对北京城市现代化的影响等重要问题，初步建构了民国北京“洋市民”的研究体系，初步勾勒了北京“洋市民”的日常工作与生活形态，以及与这座城市各方面的丰富互动。

齐小林和蔡蔷薇在前期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全书的书名、主要内容、学术观点、语言文字、最后定稿等则由李少兵负责，此书是研究民国北京“洋市民”问题的第一部专书，缺点错误一定很多，这些错误都由李少兵负责，诚请读者朋友不吝指教，以便在第二部研究专书中改正之。

## 第一章 日益扩大的北京洋市民群体

有历史文献记载的北京第一个洋市民是基督教方济各会士、意大利人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 1247—1328年)。他受教皇尼古拉四世的派遣,于1294年来到元大都北京——欧洲文献称为“汗八里”,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召见,并允许他在元帝国传教。1307年,他被教皇任命为汗八里和东方的主教,在北京建立了教堂,归化了一批基督教信徒。孟德高维诺以元大都为中心,在中国生活了34年,最后逝世于北京。

考古资料明确证实的北京早期洋市民则是大名鼎鼎的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1601年,耶稣会士利玛窦心怀坚定的传教信念、长途跋涉来到北京,觐见了万历皇帝,以后即长住北京进行传教活动。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长逝,葬于平则门外二里沟嘉兴观右侧。其墓今天仍在,位于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6号,墓前有碑,碑上刻有“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八个大字。另有一碑,刻有碑文,“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利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辛年航海首入中华衍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墓碑后面是砖砌坟墓,墓高1.5米、长2.4米、宽1.3米。

另一位赫赫有名的北京洋市民是德国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623—1666年,除了有3年在西安外,他一直住在

北京，历经明、清两代，供职于钦天监。死后葬于利玛窦墓左侧。清代内城只准旗人居住，但朝廷格外开恩，允许汤若望住在内城的天主堂，还禁止八旗兵前去滋扰。

由于欧洲传教士在数学、天文、历法、火器等方面有专长，又遵守清朝法律，愿意为清廷效力，顺治、康熙皇帝对传教士及其传教活动采取了优容政策。居留北京的欧洲传教士越来越多，1694年达到了530人，1695年增至614人，1696年人数继续增多，有633人。1704年，罗马教皇禁止派赴中国的传教士为传教方便而入乡随俗、参与祭祖祭孔等活动，康熙则下令把一部分遵守教皇谕令的传教士驱逐出境。北京的欧洲传教士人数开始减少，到嘉庆年间，只有不到100人了。

有清一代，北京最著名的洋市民始终是钦天监监正，这一官职也始终是来华的欧洲传教士最向往的。1644—1805年，有11位耶稣会士先后担任了此职。除了汤若望，还有比利时人南怀仁(F. Verbiest)，意大利人闵明我(C. F. G. rimaldi)，德国人庞嘉宾(K. Castner)、纪理安(K. Stumpf)、戴进贤(I. Koëgler)，奥地利人刘松龄(A. Von Hallerstein)，葡萄牙人安宁国(A. Rodrigues)、傅作霖(F. de Rocha)、高慎思(J. d'Espinha)、索德超(J. B. de Almeida)<sup>①</sup>。

此外，长住北京的洋市民中，还有著名的宫廷画师意大利人郎士宁(G. Castiglione)、法国人张诚(J. F-Gerbillon)。

除传教士外，清代还有一些俄国人长住北京。史书记载的最早居于北京的俄罗斯人是伍朗格里，时间是顺治五年，即1648年。1683—1685年，康熙对沙俄进犯黑龙江雅克萨进行了坚决反击，俘虏了一批俄罗斯哥萨克人，并把他们迁入北京，编入满八旗中的镶黄旗。《钦定八旗通志》记载：“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将尼布绰地方取来鄂罗斯三十一人及顺治五年来归之鄂罗斯伍朗格里、康熙七年来归之鄂罗斯伊番等编为半个佐领，即以伍朗格里管理。后二次又取来鄂罗

<sup>①</sup> [法]谢和耐、戴密微等著，耿昇译：《明清间耶稣会士入华与中西汇通》，代序9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斯七十人，遂编为正佐领。”<sup>①</sup>

清朝对第十七佐领的俄罗斯人给予了妥善安置。“他们完全和满洲人一样受到尊重。给他们安排了住房，派了佣人，还规定每隔三年发给他们四时所需的衣服，将步军统领衙门收押的女犯配与他们为妻，还给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匹配了大户人家的妇女”<sup>②</sup>。

这些俄罗斯人先是逐渐满族化，后来又慢慢汉化了。1845年，俄国外交官科瓦列夫斯基访问北京，见到了这些俄罗斯人的后代。他回忆说：“中午前我们来到了南馆，大司祭和传教士团成员们已在恭候我们，还有阿尔巴津的男女老少近百人，几乎都来了。看到这些俄罗斯人的后裔有种很奇怪的感觉，他们的服饰、语言、容貌一点都不像俄罗斯人。”<sup>③</sup>

由于《尼布楚条约》允许俄罗斯东正教在北京建立新教堂，俄罗斯传教团就在宫廷广场（今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东江米巷（今东交民巷）修建了新教堂，并把教团迁了过去。1715—1865年，共有15批传教士团来到北京，住在东江米巷。<sup>④</sup>

东正教传教团的影响力在北京俄罗斯人中越来越弱，因为长期定居此处的俄罗斯人越来越“入乡随俗”，特别是他们娶了中国妻子之后。中国妻子们把俄罗斯丈夫带到佛像面前说：“连皇帝本人也得尊敬它，向它磕头，何况全国人民都信它。你是一个在森林里长大的野人，难道你认为你比皇帝还要聪明？”<sup>⑤</sup>

这样的劝导往往是有效果的，这些俄罗斯丈夫就不再与东正教祭司来往，而改信中国的佛教了。

① 《钦定八旗通志》第3卷《旗分志三》，第1册，44～45页。

② [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著，杨诗浩等译：《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1册，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③ [俄]叶·彼·科瓦列夫斯基著，阎国栋等译：《窥视紫禁城》，116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④ 《历史研究》编辑部：《故宫俄文史料》，1964年铅印本。

⑤ [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著，杨诗浩等译：《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1册，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根据条约，清朝允许欧美列强在北京设立使馆，派驻公使。各国陆续在东交民巷设立了使馆，驻北京的欧美外交人员开始增多。1901年以后，根据《辛丑条约》，东交民巷完全成了外国人办公、居住区，北京各种职业的外国人群明显增加。

1908年，北京(不含东交民巷使馆区)外籍人士已有548人，其中英国56人，法国64人，德国37人，美国22人，俄国29人，意大利15人，比利时12人，奥匈帝国6人，荷兰5人，日本265人，其他国家37人。<sup>①</sup>

总体来说，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后至1937年日本入侵，在京欧美人士的群体规模不断扩大。从人口数量、构成、分布、流动等层面来看，北京欧美人士群体呈现如下一些特点。

## 第一节 人数总体增长

晚清至民国时期，北京外国人的总数量，总体上缺乏精确的统计。居住在东交民巷使馆区以外的外国人，尚有北京警察厅(或后来的北平市公安局)统计数量。而使馆区内，外交使团或其管理机构则似乎未对使馆区内的人口做过精细的统计<sup>②</sup>。

在1900年以前，在京的欧美侨民人数很少——欧美各国公使馆外交人员加起来不到50人，赫德(Robert Hart)领导的海关在北京总税务司的工作人员大约12人，汇丰银行(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在北京的办事处2人，有两个外国商店，还有一些传教士零星散落在城内各处<sup>③</sup>。

《辛丑条约》签订后，由于使馆卫队人数及来华外国人的增加，北京

① 清光绪朝民政部统计处：《民政部统计表》之《京师内城各厅区寄居外国人口统计表》《京师外城各厅区寄居外国人口统计表》，71~74页，1908。

② Sidney D. Gamble, *Peking: A Social Survey*, 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mpany, 1921, p. 111.

③ William J. Oudendyk, *Ways and By-Ways in Diplomacy*, London: Peter Davies, 1939, p. 24.

欧美人士的数量增长较快。1905年1月，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写给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的信中提到，李家森与奥特韦尔小姐在撒道义家的花园里举办婚礼，“婚礼办得很隆重，各使馆的人都在那里，有250多人参加，真是一次最愉快的联欢会”。而且，据赫德的估计，1905年，在京的外国人(含使馆区人员)大约达到两三千人<sup>①</sup>，这其中既有西洋人，也有东洋人即日本人。

1910年以后，东交民巷使馆卫队人数呈下降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意大利、奥匈等国使馆卫队几乎全部撤出中国；俄国使馆卫队人数于1914年以后大部分撤出中国，苏联建立后不再派驻使馆卫队。20世纪20年代，各国使馆卫队人数由1901年的2000余人下降到1000人左右，而且美国使馆卫队人数在各国使馆卫队总数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是，在中国局势紧张、外国人感觉有义和团再现的危险时，如辛亥革命、国民革命时期，北京外交使馆的卫队人数会暂时增加，以保卫东交民巷使馆区及北京城内外国人的安全。

表 1.1 东交民巷使馆卫队人数统计表<sup>②</sup>

国籍	1901年	1911年	1913年	1917年	1922年	1928年
美国	150	160	309	274	354	450
法国	300	219	288	274	不详	180
英国	250	266	370	100	不详	184
日本	300	154	307	260	不详	140
意大利	200	220	199	35	不详	50

<sup>①</sup> 陈霞飞主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第7卷，777、8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sup>②</sup> 1901年数据参考自Chin-chen Chu, *the Diplomatic Quarter in Peiping*, 1943。1911年数据参考自*The Capital: The Legation Guards,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70—1941)*, Aug 5, 1911。1913年和1922年数据参考自[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917年数据参考自Y. M. C. A. For Legation Guards: Report from 1st October to 1st May, *Peking Daily News (1914—1917)*, Jul 12, 1917。1928年数据参考自*The Future of the Legation Quarter,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923—1950)*, Jun 16, 1928。

续表

国籍	1901年	1911年	1913年	1917年	1922年	1928年
俄国	300	21	301	22	不详	—
德国	300	125	151	—	不详	—
奥匈	200	35	—	—	不详	—
荷兰	—	—	35	34	不详	—
比利时	—	—	31	—	不详	—
总数	2000	1200	1991	999	997	1004

到了1920年，海关报告中曾估算，北京有外国人4000名左右，“邮政局在1920年估算的人口数字也许和被查明的人口数字一样准确。……北京的人口是1133541，其中包括4000名外国人”<sup>①</sup>。至于在京欧美人士的数量，笔者统计了1922年由英国人蓝慕山(Alexander Ramsay)整理、编撰出版的《北京名人录》(*Peking Who's Who*)<sup>②</sup>中所列的外国人名录，有男性1143名，女性737名，共1880名。但是，名单上只收录了少数几个俄国人和日本人，也未将使馆卫队人数纳入统计。因此，若加上100名左右的俄国人和800名左右的欧美各国使馆卫队人数(见表1.1)，则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欧美侨民总数大约为2800人。美国《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Edward Abend)估计，1928年左右，“除使馆卫队外，偌大的北平，平均只有区区两千六百名美欧人士居住”<sup>③</sup>。

根据民国北洋政府内务部统计科编制的《内务统计》，1920年北京

①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on Trade, Industries, etc. 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 and on the Con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s 1912-21, Vol. 1—Northern and Yangtze Port*, Shanghai: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p. 146.

② Alex. Ramsay, *Peking who's who*, 北京：通商行名编辑处，1922，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③ [美]哈雷特·阿班著，杨植峰译：《民国采访战：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阿班回忆录》，8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总人口为 849554 人<sup>①</sup>，而根据海关报告给出的数据，1920 年北京人口总数则达到了 1133541 人<sup>②</sup>。在京欧美侨民数量如果以 2800 人计算，则其占北京总人口的比例大约分别为 0.33% 和 0.25%，可见，虽然民国时期在京欧美人士群体呈扩大趋势，但其在北京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小，从这个角度讲，整个民国时期，北京都不是像上海那样的国际化大都市，而只是一个“城门”打开了的，有了现代元素的变迁中的城市。

当时，整个中国的外国侨民数量并不算少。据海关报告的统计，1920 年共有 326069 名外国人侨居中国<sup>③</sup>，而费维恺 (Albert Feuerwerker) 估计，1920 年左右在华各种职业的外国人总数约为 278369 人<sup>④</sup>，不管哪个数字更接近真实的外国侨民在华人数，北京外国人数量 (以 4000 名计算) 占在华外国人总数的比重都相对较小，分别约为 1.2% 和 1.4%。当时，在华北的天津和华东的上海，外国人的数量都多于北京。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军队侵占了北京，欧美侨民开始大规模撤离北京。1941 年 12 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据估计，仍然留在北京的英美侨民约有 550 人，其中三分之二是传教士<sup>⑤</sup>。

从具体国籍来看，北京的欧美人士中，美国人数量的增长幅度最大；英、法、俄等国人数虽也有增长，但幅度较小；而由于第一次

① 内务部统计科编：《内务统计·民国九年分京师人口之部》，1923 年铅印本。

②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on Trade, Industries, etc. 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 and on the Con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s 1912-21, Vol. 1—Northern and Yangtze Port*, Shanghai: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p. 146.

③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on Trade, Industries, etc. 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 and on the Con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s 1912-21, Vol. 1—Northern and Yangtze Port*, Shanghai: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p. 176.

④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 1912—1949 年》(上)，164~165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⑤ [美]拉福林：《大东亚战争发生后美国人在北京的生活状况》，载《三六九画报》，1942，13(2)，14 页。